

海外视野

栏目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全民阅读教育研究院院长郭英剑教授

当大学失去拒绝的能力: 爱泼斯坦事件与学术的边界危机

■郭英剑

今年2月,最新解密的杰弗里·爱泼斯坦案文件再次震惊了美国学术界。随着文件的公开,一个长期存在却始终未被彻底揭开的网络逐渐显现。美国哈佛大学前校长劳伦斯·萨默斯因与爱泼斯坦来往密切,被迫辞去教职;语言学家诺姆·乔姆斯基因与爱泼斯坦的“深厚友谊”也被曝光。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渗透”并非简单的金钱往来,而是一种通过信任、声望与网络关系逐渐展开的过程。也正是在这样的过程中,学术界的边界被一点点模糊,甚至被重新定义。

在这错综复杂的网络背后,有一位并不为公众熟知却长期活跃于科学与思想界核心圈层的人物——约翰·布罗克曼。他被称为“科学出版界最有权威的人”,更被一些评论者视为连接资本、知识与权力的重要中介。正是通过他,一些本不应轻易被跨越的界限,变得可以被协商、被绕过,甚至被合理化。

2月23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发表长文《杰弗里·爱泼斯坦的学术掮客:约翰·布罗克曼如何为爱泼斯坦打开学术大门》,详细披露了布罗克曼如何充当爱泼斯坦进入精英学术圈的“牵线人”。文章不仅还原了关键事件的时间线,也揭示了更深层次的问题,当学术声望可以被“中介化”运作时,大学与知识共同体的边界究竟由谁来守护。

在此,我将基于该文及公开的文件、美国相关大学的官方报告、媒体调查报道等信息,梳理爱泼斯坦事件与高校关联的始末,以及其学术渗透路径,并进一步追问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美国学术界为何如此易于被腐蚀?或者说,当知识、资本与权力发生结构性勾连时,学术界还剩下多少自我防御的能力?

爱泼斯坦与美国顶尖高校早有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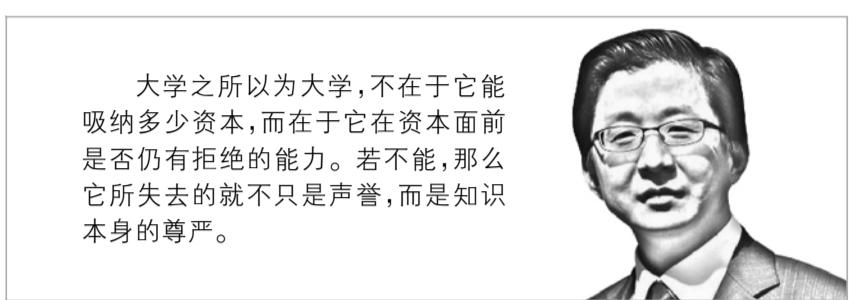
爱泼斯坦 1953 年生于美国纽约,早年以数学教师身份起步,后进入华尔街,20 世纪 80 年代成为独立资产管理人,自称“亿万富翁”。从一个普通教师到金融精英,他的上升轨迹本身就带有某种典型的“美国式传奇”色彩。而正是这种表面的成功,为其后来的社会渗透提供了重要掩护。

早在 21 世纪初,爱泼斯坦便开始频繁出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MIT)、斯坦福大学等学术机构,并与多位知名科学家建立联系。例如,著名的物理学家劳伦斯·克劳斯就接受了其 25 万美元的项目资金,并且在 2008 年爱泼斯坦首次被控性犯罪案后仍与他合作,还曾表示“我从科学家的角度相信他”,认为爱泼斯坦“致力于支持科学”。相关言行随后引发巨大争议,因为它直接揭示了学术界在面对资金时的道德模糊地带。

与此同时,MIT 媒体实验室负责人伊藤穰一也曾承认,在爱泼斯坦 2008 年被定罪之后,该实验室仍通过“匿名捐赠”等方式继续接受其资金。这一事实则揭示了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制度性困境。伊藤穰一后来郑重道歉并从 MIT 辞职。



近年来,我国经济正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创新创业成为国家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重中之重。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过程中,“双创竞赛”“挑战赛”等国家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以下简称“双创竞赛”)得到迅猛发展。然而,伴随着“双创竞赛”规模的快速扩大以及竞赛结果的权威性、使用率和影响力被不断强化,也出现了“双创竞赛”结果被过度追捧,甚至“奖项至上”等短视、浮躁、急功近利和弄虚作假等问题。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的成果情况和比赛形式决定了竞赛奖项仅为激励成分居多的象征性结果。从成果情况看,获奖成果理应为优秀的创新创业参赛项目,而客观上这些获奖项目团队大多为了竞赛而组建,竞赛结束也就解散了,这些获奖成果的成效其实并未得到真正体现。从比赛形式看,无论在成千上万份项目申报书或作品被遴选的前期阶段,还是在后期的每支参赛队伍都有几分钟或十几分钟项目路演的高级入围赛阶段,要靠若干专家评委当场区分参赛成果水平的高低几无可能。实际上,不少利益相关者对大学



如果说金钱是进入学术世界的门票,那么“与知识精英的合影”则成为爱泼斯坦最重要的“身份背书”。在这一意义上,他的真正目标或许并不是进入大学,而是借助大学为自己重塑一种“可以被信任”的形象。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学术界原本应当坚守的边界被一点点侵蚀,而这种侵蚀往往发生在“看似合理”的合作与交往之中。

布罗克曼如何成为“牵线人”

如果说爱泼斯坦是资本与权力的操盘者,那么布罗克曼则是将这种资本转化为“知识合法性”的关键中介。爱泼斯坦对学术界的渗透并非偶然,而是通过精心构建的“科学慈善家”形象实现。这一形象之所以能够建立,正是因为有像布罗克曼这样的“解释者”与“引路人”。作为文学经纪人、Edge 基金会创始人,他不仅掌握科学出版与思想传播的关键渠道,更掌握着一个隐秘而高效的“信任分发系统”。

布罗克曼是 Edge 网站的创始人。这个平台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产出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成果,而是通过“问题”来组织思想——每年提出一个“大问题”,邀请顶尖科学家、思想家作答,并集结出版,成为全球知识精英的“第三文化”平台。正如布罗克曼自己所称:“第三文化”由那些正在取代传统知识分子的科学家与思想者构成。这一理念本身就带有一种重构知识权威结构的雄心。

也正因如此,他的客户名单堪称“思想界的权力地图”,几乎全部为顶尖学者,同时也是公共知识的生产者与传播者。他们的背书本身就具有极强的象征意义。布罗克曼真正的“发明”,并不只是一个网站,而是一种连接资本与知识的机制。他每年在 TED 大会期间举办“亿万富翁晚宴”,将科技巨头与科学家置于同一空间之中。这种场合看似轻松,却具有重要的结构性意义。它创造了一种“非正式的权力场”,在这里资金、思想与声望得以交换与再分配。

爱泼斯坦正是在这样的场域中,完成了关键的“身份跃迁”。自 2000 年起,他频繁参加该晚宴,并迅速成为 Edge 基金会的重要金主;1998-2008 年间捐赠 50.5 万美元,之后持续资助,直至 2015 年最后一笔。更重要的是,布罗克曼不仅接受爱泼斯坦的“配置资源”,还让爱泼斯坦资助晚宴嘉宾的研究项目,从而在学术界内部建立起一条隐秘却有效的影响链条。至此,一个清晰的模式浮现出来。

布罗克曼的“牵线”机制,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三方共赢的结构:科学家获得资助与曝光,爱泼斯坦获得学术光环,布罗克曼则进一步巩固其在科学出版领域的主导地位。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共赢结构”之中,问题悄然显现。因为,一旦知识的流通开始依赖中介,声望的分配开始受到资本影响,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判断标准就不再完全由其自身决定。换言之,布罗克曼并不是简单地“介绍人脉”,而是在无形中重构了一套新的规则:谁可以进入、谁值得被听见、谁能够被看见。

而当这种规则不再透明、不再可追随时,学术界所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个体的道德问题,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脆弱——一种在资本、声望与人际网络交织之中逐渐失去自我边界的脆弱。

布罗克曼的“牵线”机制,实际上构成了一个三方共赢的结构:科学家获得资助与曝光,爱泼斯坦获得学术光环,布罗克曼则进一步巩固其在科学出版领域的主导地位。然而,也正是在这一“共赢结构”之中,问题悄然显现。

因为,一旦知识的流通开始依赖中介,声望的分配开始受到资本影响,学术共同体内部的判断标准就不再完全由其自身决定。换言之,布罗克曼并不是简单地“介绍人脉”,而是在无形中重构了一套新的规则:谁可以进入、谁值得被听见、谁能够被看见。

而当这种规则不再透明、不再可追随时,学术界所面对的就不再只是个体的道德问题,而是一种结构性的脆弱——一种在资本、声望与人际网络交织之中逐渐失去自我边界的脆弱。

美国学术界怎么了

如果说布罗克曼的“牵线”机制揭示了一种运作方式,那么爱泼斯坦事件真正令人不安之处在于,这一切并非偶然的个案,其恰好能够嵌入美国学术体系之中,并长期运转。这意味着,问题不在边缘,而在结构本身。可以说,爱泼斯坦的渗透正是沿着如下这些结构性缝隙一步步展开的。

首先,资金饥渴与“捐赠者至上”文化。在当代美国大学体系中,私人捐赠早已从“补充资源”转变为“核心支柱”。顶尖大学的科研、实验室、跨学科项目,往往高度依赖外部资金支持。在这一背景下,“谁提供资金”,便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一个人“可以被研究”。

其次,精英网络的文化。如果说资金提供了入口,那么精英网络则决定了谁能够被接纳。布罗克曼的 Edge 晚宴等活动表面上是思想交流的场域,实则构成了一种高度封闭的社交结构。这种结构往往强调“前沿思想”“大胆观点”,但其潜在逻辑却是“金钱-关系-影响力”的循环再生产。

再次,选择性忽视与道德豁免。更深层的问题在于一部分学者并非“没有看到问题”,而是选择“只看自己想看的部分”。这种现象被著名生物学家乔治·丘奇事后称为“书呆子的隧道视野”。在这种视野中,智力被绝对化,道德被边缘化。虽然丘奇后来为此说法道歉,但这样的表述并非简单辩解,事实上反映出了一种更为根深蒂固的观念:只要有助于知识生产,其他问题可以暂时搁置。然而,问题恰恰在于“知识”成为唯一尺度时,学术便为自身开辟了一条

中国大学评论

摒弃“奖项至上”,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须回归教育实践

■樊秀婷

项目,虽然各方都能做到不计成本地投入,但其实很多经费并没有用于实质性的创新创业活动。

最后,削弱了大学生对知识的敬畏。对于学生来说,高级别的“双创竞赛”奖项对其评优评奖、保研和求职等意义重大,而想要获得这些奖项,向导师、学长索要项目本子或委托机构代理项目本子,可能远比自己辛苦探索更为“有效”。从某种程度上讲,在至多十来分钟 PPT 路演的“一锤子买卖”中,学生想凭借自身的“真才实学”脱颖而出的确很困难。

综上,要坚决扭转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中“奖项至上”的功利化倾向,促使“双创竞赛”回归教育实践本身。从本质上讲,“双创竞赛”是一种教育手段和工具,其价值主要在于学生在过程中提升理论与实践能力,而非仅仅获得象征性的奖项证书。为此,各方主体需秉持长期主义的创新创业教育目标,将“双创竞赛”融入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让“以评促学”落到实处。

个人认为,现行“双创竞赛”全国层面的 PPT 路演比赛及奖项颁发需要大幅度缩减。这绝不意味着“双创竞

赛”不需要国家层面的关注,相反,这恰恰体现了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高度重视。“双创竞赛”的教育价值和实际成效体现在学生校本或地区的实战活动中,而非在于学生一二级往上打比赛。而且,“双创竞赛”本应往下扎根,而这种往上打比赛的形式,还会造成学生精力分散、教育经费浪费以及创新创业生态不良等诸多问题。同时,鉴于“双创竞赛”的实际成效短期内难以评判,是否需要设置国家级奖项也值得商榷。

发展至今,大学生创新创业竞赛中的“奖项至上”愈演愈烈,问题的根源在于相关部门及社会排行榜机构对奖项指标的依赖。事实上,“双创竞赛”奖项既不能全面体现高校“双创竞赛”的实际水平,更不能全面反映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整体水平。但不得不承认,只要这些奖项存在,现阶段学校和学生就会受制于这些评价导向而被裹挟进“奖项至上”的竞争中。因此,要摒弃“奖项至上”,切实支持大学生开展创新创业,还需要相关部门、高校和全社会协同努力。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

道道德豁免的通道。此外,声誉洗白机制。在上述结构的支撑下,爱泼斯坦得以完成其最关键的一步,将“金钱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他通过资助项目、网站推荐、私人飞机接送等方式,换取学者的公开背书与隐性认可。其个人网站列出“资助奖项”与科学家证言,正是典型的“声誉洗白”操作。而布罗克曼则在这一过程中提供了不可或缺“学术合法性包装”。换言之,学术界不仅被利用,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种转化。

警惕“知识精英”的脆弱性

在我看来,爱泼斯坦案真正令人不安的,并不只是一个罪犯曾出入名校、结交名流,而是他竟能借助学术的光环,为自己不断续写“体面”的履历。一个本应守护真理与公共价值的世界,竟在金钱、声望与关系面前,一次次降低门槛,这才是问题最严重的地方。这说明知识并不会天然导向道德,聪明也并不必然带来清醒。恰恰相反,越是身处精英网络,越可能对自己的判断产生过度自信;越是习惯于被尊重的人,越容易把“例外”当成自己的特权。于是,学术界最危险的时刻,往往不是无知蔓延之时,而是自以为足够理性、足够高明,因而对诱惑失去警觉之时。

爱泼斯坦所利用的,正是这种脆弱性:大学对资金的依赖,学者对资源的渴望,精英圈层对彼此背书的迷信,以及知识共同体对自身道德形象的过度信任。换言之,他并不是凭一己之力攻破了学术界,而是学术界内部早已存在裂缝。

因此,真正需要重建的,不只是捐赠审查制度、交往透明机制与利益冲突规范——这些当然重要;更重要的是重建一种更为朴素、更为坚定的学术伦理:不是所有的钱都能拿,不是所有的人都值得交往,不是所有“有助于研究”的资源都值得欢迎。

大学之所以为大学,不在于它能吸纳多少资本,而在于它在资本面前是否仍有拒绝的能力。若不能,那么它所失去的就不仅是声誉,而是知识本身的尊严。

当前,工程教育中的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相脱节的现象并不少见。事实上,工科高校早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并开设了大量人文社会科学类课程。在培养方案中,很多学校也要求学生必须选修一定比例的人文社科类学分。

与此同时,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两张皮”现象仍普遍存在,理工科课程与人文社科课程缺少融合,理工科师生与人文社科师生也缺少交流。理工科教师仍然习惯于主要从技术的角度评价学生。

一件作品争议的背后

在一次科技创新竞赛中,某工科学子团队提交的参赛作品是一款能帮助聋哑人与健听人交流的 App。它能够通过摄像头捕捉聋哑人的手语动作,并转换为语音输出。

按照惯性思维,聋哑人做手语动作是给健听人看的,通常需要后者用手机拍摄聋哑人的手语。但现实中,绝大多数聋哑人很少接触聋哑人,因此不会在手机中安装此类 App,反倒是聋哑人出于交流的目的,对其十分需要。

这就导致一个结果——聋哑人在与健听人交流时,都要把手机固定在对面拍摄自己的手语,不仅很不方便,也会增加聋哑人的心理负担。对此,该团队提出的解决方案是将手机固定在聋哑人胸前,从主观视角拍摄手语动作,这与从对面看到的手语动作不同,因此需要进行转换。

对于这一作品,以工科教师为主的评审委员会产生了分歧,多数评委认为它的技术难度并不大,不宜评高分;也有评委认为它充分考虑了用户需求,能带给聋哑人很好的体验,应给予较高评价。

这一事例背后,反映的是目前工程教育本身的某些缺陷。

工程是运用科技在一定约束条件下,为满足人的需求而创造人工物的过程及成果。因此,工程是由技术要素和非技术要素组成的综合系统。技术要素是指工程所依据的科学原理、采用的技术手段,以及实施过程中需要解决的各种科学技术问题;非技术要素则包括工程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实施工程所需的各种资源,以及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人。谈及工程系统中的人,我们首先想到的可能是企业家、工程师、工人,但另一类更加重要的人——用户,却经常被忽略。工程界有一句口号:“工程造福人类。”工程是为人服务的,不仅要满足人的需要,还要提供良好的使用体验。

所以,工程从设计、施工、运行到最后产品报废的整个生命周期中,都要充分考虑用户的需求和体验,而我们的教育对此似乎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不考虑人的工程毫无用处”

也有一些具有启发性的事例。比如,美国克林工学院为大学一年级学生开设了一门名为“人类工程”的选修课。该课程面向工程设计零基础的学生,系统教授“端到端设计”全流程,培养学生基本设计能力。课程采用项目学习方法,任务是设计老年人使用的产品。学生们组成 3-5 人的小组,以团队合作的方式开展设计。

课程的第一阶段是开展同理心活动。学生们邀请老年志愿者作为合作伙伴,一起看电影、购物、聚餐,增进情感交流;观察并模拟老年人的日常生活,体验衰老带来的身体上的不便和心理上的挣扎;与老年人举办研讨会,梳理他们的各种需求。

在此过程中,学生要提交“合作伙伴画像”,在课程网站发表至少 4 篇博客;同时要阅读其他同学完成的书面材料,共享各自体验。教师和学生讲解项目原则,指定阅读书籍,组织开展讨论。在此基础上,学生归纳出老年人的关键需求及其特征,从而实现与老年人的共情。

第二阶段是提出潜在在产品构想。学生聆听专业人士的演讲,如老龄化产品初创公司创始人、设计研究人员以及阿尔茨海默病专家等;参观为老年人提供服务的机构,如持续护理社区、急救呼叫中心等。学生与教师、老年合作伙伴深入研讨,生成至少 3 个潜在产品构想。

此外,学生团队还要举办类似“科学博览会”的活动,在更大范围内向专业人士和公众展示产品构想。专业人士经评审并收集公众意见,最终选定一个设计方案。

第三阶段是完成最终产品的原型,同时也包括相关书面文件。老年合作伙伴全程参与设计,从用户角度提供意见。学生团队创建“交互日志”,请老年合作伙伴记录使用产品的体验。在此阶段,设计方案分别经过两次内部审核和外部评审,目的是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特别是来自用户的体验。最后一次外部评审要确保交付的产品表现良好,并对产品进行评分。

课程结束后,教师团队系统分析“合作伙伴画像”“交互日志”等文档,并对学生和老年合作伙伴进行访谈,总结了学生的收获。

首先,共情认知能力显著提升。课程开始前,学生对老年人的评价以负面为主,如“病态”“虚弱”“迟钝”“孤独”;学习课程以后,学生作出了更多的正面评价,如“有趣”“充满故事感”“足智多谋”“有经验”。

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 应基于真实工程问题

■曹庆

一位学生坐在轮椅上在校园里闲逛了几个小时后感悟到:“在轮椅上接受他人的帮助,可能会令人感到沮丧。如果我需要以轮椅代步,我希望尽可能保持自理能力。”这些都表明,课程在情感层面引发学生的反思。学生对老年人的认识发生了转变,从“他们需要帮助”转变为“将他们视为普通人”。

其次,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意识明显增强。课程初期,学生将设计视为体现设计师的需求和价值观念的机会;而课程结束时,学生意识到用户在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中的核心作用。有学生在博客中写道:“我可能没有将某些事情视为非常重要,并不意味着这对他人也不重要。”

最后,对工程有了新的认识。通过学习课程,有学生得出结论:“不考虑人的工程毫无用处。”还有学生说:“我原本以为自己不会成为一个好的工程师,而这门课程告诉我工程有多么重要。”

学生需面对“真实的世界” 克林工学院这门课程给了我们一个重要启示,就是真实的工程问题是促进技术教育与人文教育融合的有效载体。真实的工程问题有几个特点:一是面向真实用户,因为一切工程的目的都是为了满足用户需求。这些需求不仅外显为用户对产品功能的要求,还有隐含的情感体验。在很多情况下,用户可能无法清晰地表达自身需求,甚至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就需要工程师通过观察、交流及亲身体验发现用户的需求。

二是真实的约束条件,特别是非技术方面的约束。实施某项工程,工程师要考量成本、市场因素,坚守法律法规底线,遵从公序良俗,关照到所有利益相关者。

三是完整的工程实施过程,以及具有实际价值、可交付的成果。工程师要着眼全局,从始至终肩负起对用户和社会的责任。

长期以来,工科学生的工程实践大多在校园环境中开展。要解决的问题虽然来自企业,但通常只是被解构的问题,留给学生的只有技术性要求。另一些问题则由教师或学生自己提出,没有具体用户,需求往往只是设想。加上受时间和条件限制,问题所受的约束被大大简化,学生只需专注技术。用户缺失、需求不明、约束简化,导致最终成果与实际应用相去甚远。

在学生心目中,这样的实践仍是学习和练习,难以使他们认识到工程的价值并形成责任感。政府、社会、企业和高校应当创造条件,让工科学生在学习期间就有机会解决真实世界中的工程问题。面对真实世界,学生就不能仅考虑如何解决现成的问题,而必须以更高的站位去思考:我能为谁解决什么问题,怎样更好地解决问题。这将促使工科学生把追求技术的先进性、复杂性对人的尊重、对社会的责任,以及服务国家、造福人类统一起来。

(作者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教授)